

读书苦乐

外国文化名人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



序

在《中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出版的时候，编者曾经说过：

“在教育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读书成为人们议论热点的今天，《中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的出版，我想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是一个有着藏书和读书优良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时候，不读书的风气会滋生、蔓延开来呢？为什么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之家，会独独没有一架书柜呢？这是我这几年来常常思考和读书看报时留意的问题。我将这几年见到的，自以为重要的篇什，搜集拢来，汇编成册，参与社会的议论。”

《中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8000 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是十分可喜的。出版社在再版书的同时，嘱余再编一册《外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与之合，我是乐于接受这一任务的。

自从 16、17 世纪之交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量”的口号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惊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在 100 年间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人类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中国人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已经努力了一个半世纪，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诞生了。人们认识了知识和科学的价值。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已成为社会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而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似乎仍令人忧虑。从表面看，社会到处充斥着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公园文化、广告文化、书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鬼文化……文化已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众多的文化名目下，有些人却干着没有文化乃至糟塌文化、毁灭文化的勾当。188888 元一桌的宴席上有多少食文化的因子自不待说。近年来，推背图、预测学、观人术、星相学、看手相一类图书的走红，成为出版业的热点，我想也不是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如果迷信也是一种文化，但无论如何，我想总不是一种科学。怪不得有人担心大有“众人说文化而文化亡”的危险；也怪不得有人担心，除了赚钱，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轻蔑地抛弃别的有价值的一切。但是我想，市场和金钱，并不等于社会的一切。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如果造原子弹的收益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还不如拿剃头刀的局面不改变，想在社会总体上扭转读书无用的论调是决无可能的。编者这项工作当然不是武器的批判，作用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编者相信，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读书无用论”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养成全社会好读书、读好书的风气，恐怕还需社会各界的继续努力。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社会正气的发扬。

编者见识不广，读书有限，加上中文翻译资料的缺乏，遗漏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一些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名家没有文章入选，这是十分遗憾的。所选文章也不尽恰当。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待有机会重版时

再补充修正，这是编者的愿望。

最后，对众多的译者，致以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辛勤的笔耕，这本书是无法跟大家见面的。

编者

1995.6.

外国文化名人论读书苦乐

第一编 书

蒙田（1533—1592）

法国思想家、散文家。父亲是富商，曾任波尔多市市长。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后在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曾在波尔多法院任职 13 年。父亲去世后继承爵位，两年后回乡从事写作，但常为巴黎法院办事，并涉足政界，曾当过国王亨利三世的侍从，在军队中服役多年，参加过拉费尔包围战。蒙田喜欢游览，曾游历瑞士、意大利、德国、奥地利。1581 年起当选并连任两届波尔多市长。蒙田的主要贡献是他用毕生精力写作的《随笔集》。这些随笔形式自由，旁征博引，富有生活情趣，对近代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读者已遍及世界，是公认的随笔巨匠。

论 书

毋庸讳言，我经常言及那些领域中精明的并拥有更多真理的大师们所论及的事物。我这样做，不是受我所获得的知识驱使，而是我天赋能力使然。如果某人说我无知，他不会有什么胜于我的优势，因为对于我的推理几乎是很难回答的。当我对他们来讲是难以解答的时候，我就决不可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这其中的原委还是让那些追求知识的人去探究吧。对我而言，无物能为我之禁区。我所热衷的不是向他人转达关于事物的知识，而仅仅是关于我自身的见解。或许，有那么一天，我能具备某些客观的知识，或许在过去，我曾经占有了某些客观的知识，那也只是对某物予以阐释时偶然附带的。它们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逝了。诚然，我也读过一些书籍，但我不曾将它们窃为己有。

为此，我所谈及的仅仅是我当下的知识，而不能提供任何业已确定的知识。人们不必执著于物本身，只消悉心于我所赋予的意义就是了。至于我所选择的方式是否正确，能否阐明我所借来的这一题目，还是让别人来评判好了。我倒希望有人能够说出我自己所未能说出的东西，这样可以补救时而因我语言贫乏，时而因我缺乏了解所造成的不足。我并不重视我所借鉴的东西的数量，我要衡量的是它们的价值。倘若我希望它们可以因增加数量而变得珍贵，我本可以再加上两倍。不过，它们确已够了。单就名字而论，它们就颇为闻名且又古老。况且，这些东西的作者已经自己阐明了他们的见解，无需我来代劳。需要说明的是，凡涉及论据和移入本文的概念的地方，我有时不得不有意回避材料来源，为的是制止那些鲁莽的评论家草率行事。正是那些评论家，习惯于抓住每一部作品，特别是抓住那些尚生存于世的作家的新作。他们的评论，用语粗俗，摆出一副凡人皆可评论的架势；似乎唯其如是，方能证明他们的想象和构思也是通俗的。倘若可能的话，我倒愿意改头换面，借助普

鲁塔克 和塞内加 来乔装打扮。为掩饰我自身的缺欠，我需要利用这些伟人的美德。但我由衷地欢迎有人能够剥下我的“羽毛”；只是，他们应当根据明确的判断，即是说，应当从甄别古代语言所具有的豪放和婉约的意义上，除去我的伪装。我的记忆诚然不佳，经常分辨不清材料的出处；但凭籍我自身的能力，我自信，在我的土壤上，生长出的只能是我所种下的花朵，就其价值而言，也无法同别人的果实相提并论。

倘若我使自身陷入困境，或者说，我的推论中存在着某种空洞而荒谬的东西，却不曾为我所觉察抑或为我视而不见，那么我必须对此作一说明。我们经常忽略错误，如有人已给我们指出而我们仍熟视无睹，这就是判断力低下的证明。没有判断，我们可以占有知识和真理；没有知识和真理，我们也可以作出判断。认识人的无知，的确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最可靠的判断的一种表现。我在创作中，从不挖空心思，只是顺其自然。某些想法一闯入我的脑海，我就使其累积起来。它们时而如潮水般涌来，时而如涓涓细流缓缓而至。即使我已经偏离了轨道，我也仍要他人看到我自身的发展过程。我只走我自己的路。顺便说一下，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无知抑或关于随意漫谈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

诚然，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完美地领悟事物；但我不希望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愉快地安度余生，而不是疲于奔命。没有什么东西能令我煞费心思，即使它是最可宝贵的知识。

读书，我只寻求那些能够令人愉快且又朴实无华的篇章；学习，我只学习这样的知识：它能够告诉我，我当如何认识我自身；我当如何对待生和死。

这正是我的马竭力趋向之鹄。

当我在读书中遇到某些费解的地方时，我从不一味冥思苦想；倘我尝试一二次后仍不得要领，我就把它甩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死啃它们，无异于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我的思维机器只在初始时才敏捷活跃，而那些不能令我当下观注到的东西，不能靠持久来解决。没有灵感，我的思维就会枯竭。过分地执著于某物，只会使大脑疲惫不堪、陷入混乱，我的眼睛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必须把注意力暂时移开，而后再回过头来不断地看看。一如我们在看一件耀眼的红色衣服时，总是先把视觉稍稍移开，然后再不断地瞥上几眼。倘若某书使我感到厌倦，我就丢开它去读另一本，只是在我无所事事时，我才再去问津那本曾使我厌倦的书。我很少拜读现代作品，对我说来，古典作品更富有魅力和活力。我并不是指读希腊文作品，因为我的理性对我所具备的这门语言知识是不满意的。

在某些纯粹的娱乐性作品中（这类作品都很时髦），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还有约翰那斯·塞库达斯的《吻》（假如

普鲁塔克（公元 46—119）：希腊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注

塞内加（约公元前 4—公元 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公元 1 世纪中叶罗马学术界的领袖人物。——译者注

普洛佩提乌斯，i, 70.

它们都能置于同一名下的话)，我发现，闲暇时读一读还是值得的。而像《阿马迪斯》以及诸如此类作品，从不曾引起我的兴趣，即使是在我的孩提时代。甚至，容我冒昧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或杰出的奥维德的作品，也无法唤起我这颗衰老的心了。奥维德的写作技巧和创新精神曾使我感慨不已，可现在却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我无所顾忌地直言我对万物诸事的见解，这或许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不过，我并不想使自己充当一名审判官。我之言及它们，仅仅是表明我的看法，而不是为这些事物来立法。当我对柏拉图的 *Axiocbus* 感到厌烦时，我就陷入了困惑：如此孱弱无力的作品竟会出自这样的巨匠之手？我不能不怀疑我自身所作出的判断。因为我尚未蠢到反对如此众多的先知们的权威，我把他们一直敬为先生和大师。我倒希望，只是我的判断错了。我的判断应当指摘和谴责它自身。因为它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不深入其内部洞悉它的奥秘；因为它以虚假的观点来曲解事物。倘它能在混乱和迷茫中保护自身，它就应当知足了。我的判断对自己的虚弱供认不讳。它承认，它正在做的就像是对摆在它面前的一幅画进行诠释，其结果往往是牵强而不完善的。伊索的大多数寓言都有多种寓意和解释，那些试图对它的象征意义详加阐释的人，往往只选择了与这个寓言相一致的方面。但一般来讲，这一方面恰恰是最肤浅、最表层的一面；更为基本的深层方面，是他们无力企及的。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我。

但是，追溯我的道路，我始终认为，维吉尔、卢克莱修、卡图卢斯、贺拉斯的诗歌是第一流的；我尤为欣赏维吉尔的《农事诗》，这部作品堪称所有诗歌中最完美的。若是以它和《埃涅阿斯纪》相比，人们就不难发现，倘若维吉尔还有时间的话，他还可以对《埃涅阿斯纪》的某些段落做进一步的润色。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第五卷是最完美的。卢卡也使我着迷，他的作品总是令人愉快。这倒不在于他的那种写作风格，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中蕴藏的内在价值，以及他的看法和判断的真实性。至于那个善良的老泰伦提乌斯，正是他使得优美典雅的拉丁语人格化了。他对精神活动方式和事物状态的描述，业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常常使我惊叹不已。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在我行进的每

阿马迪斯，是一部骑士散文传奇中的英雄。该作品从13世纪后期就开始广为流传。——译者注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这是出于他人之手的伪作。在蒙田所处的时代，这部作品的真伪已得到甄别。蒙田可能了解这一情况。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3—约前50）：古罗马哲学家，诗人。——译者注

卡图卢斯（公元前87—前45）：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名诗人。——译者注

《农事诗》是维吉尔于公元前36—前29年在坎帕尼亚创作的六韵步说教诗，共2188行，分4卷。——译者注

《埃涅阿斯纪》是维吉尔最后一部杰作。这部长诗在作者逝世后才发表，因此作者未来得及整理和修改。——译者注

卢卡（39—65）：西班牙诗人，老塞内加之孙，著有《内战记》。——译者注

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86/185—前161）：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译者注

一转折关头，我都要向他请教。我愈是迷恋于他的著作，愈是能更多地发现他所具有的新的魅力。

倘若把维吉尔比作卢克莱修，那些与维吉尔同时代的人就会抗议。我也认为，这种比较实际上有欠公允。但当我为卢克莱修的优美作品所吸引时，我的这一信念又动摇了。倘罗马人厌恶这种比较，那么他们对今天那些把亚里士多德同维吉尔摆在同等位置上的愚蠢作法，又该做如是观？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做出何种表示呢？

呵！多么乏味而又无知的年代。我认为，较之那些反对把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相提并论的人来说，古人有更充分的理由反对那些把普劳图斯同泰伦提乌斯相提并论的人。泰伦提乌斯更为时人所敬重。在罗马，他受到高度评价，他的话经常为西塞罗——罗马雄辩家之父所引证。他所获得的殊荣是无与伦比的。他还是被罗马诗人中的首席评论家所认可的戏剧家。

时下那些打算从事喜剧创作的人（包括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他们一直相当成功），往往剽窃泰伦提乌斯或普劳图斯的作品。这使我深感震惊。在他们的一部作品中，或者有从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那里抽出的三四个情节，或者有从卜伽丘那里觅得的五六个故事。他们为什么要借助他人的材料来增加自身的份量呢？因为他们缺乏自信，对天赋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缺乏魅力，不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他们需要一个靠山来支撑自身，把希望寄托在移入的这个情节上来博得我们的青睐。对泰伦提乌斯来说，问题恰恰相反：他以其典雅而优美的风格吸引了我们：无论在哪儿，他都令人愉悦，我们已无暇顾及他的情节了：

恰似清泉流水。

正是他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我们，我们如痴如醉，忘却了那些情节。

循着同样的思绪，我还可以飘向更远的地方。据我的观察，某些优秀的古代诗歌，不但没有那种傲岸而怪异的西班牙式和彼特拉克式的做作，也没有那种充塞于后世诗文中的过于缠绵、压抑的情感。一个好的评论家是不会为古代作品中没有这类情调而感到遗憾的。同样，一个好的评论家肯定会更羡慕卡图卢斯那练达而流畅的警句，而不会更欣赏马提亚尔的突兀和刺激性。这或许是我以往对他有点失望的缘由。马提亚尔只注意他自己，“他无需劳费心机，一切都由他的主题代劳了”。

这些早期作家，无需驱策自身来衡量自己的影响。他们也不用取悦自己，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所嘲弄的对象。后来的作家，却别无选

卡图卢斯，，iii，8。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7）：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译者注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他作为罗马最杰出的雄辩家而名垂青史。——译者注

卡图卢斯，，iii，8。

彼特拉克（1304—1374）：佛罗伦萨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者。——译者注

马提亚尔（约38/41—约104）：罗马著名铭辞作家。——译者注

择。他们缺少机智，需要付出更多的气力；他们只能骑在马背上，因为他们双腿无力。这种现象在舞会上同样可以看到。那些低能之辈却开办学习舞蹈之塾，他们想用危险的跳跃，奇异的杂耍动作来赢得我们的喝采。因为他们不能效仿那些高雅的舞姿。这是个窍门。女士们发现，在这种需要拼命扭动身躯的舞蹈中，她们更容易出风头：而在那种宫廷式的舞蹈中，她们需要保持端庄和得体，只能挪动着自然的舞步。

我曾见到过许多优秀的丑角演员。他们衣着相貌都很平常，但是，他们所奉献的艺术却使我们得到全身心的娱乐。而那些未经过良好训练的初学者，为了观众的一笑，却不得不涂上白脸，穿上丑服，陪上种种鬼脸，作出各种夸张的手势。倘能比较一下《埃涅阿斯纪》和《疯狂的罗兰》，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持我的论点。《埃涅阿斯纪》犹如有一对敏捷的翅膀，强健而平稳地飞向它的目标。《疯狂的罗兰》，就似有一对颤栗不止的翅膀，时而从这个故事蹦到那个故事，时而从这一段跳到那一段。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翼，在每一处都要停下来，总是担心自己会力竭而落。

他无意于远飞。

就我读到的其他读物来说，多为寓娱乐和教益于一身的作品，诸如普鲁塔克（他的书已被译为法文）、塞内加的作品。这类作品使我学到调整情绪和培养性格的知识。普鲁塔克和塞内加的风格也很适于我的性格。他们把我所需要的知识，以一种简练的随笔形式表达出来，使你无需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也是我最不擅长的）。我认为，像普鲁塔克的某些份量不大的作品和塞内加的《随笔》，都是极上乘的作品，令人获益匪浅。当我读它们时，无需凝神专注；当我无暇顾及时，又不妨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它们的篇章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是松散的。

这两位作家所持的见解（指在他们的真实性和有益性方面）大致相仿，而且，两人的遭遇也惊人地相似。命运几乎在同一时刻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作为罗马皇帝的老师，他们都来自异邦他国，都是权势显赫的豪富，他们的训示乃是哲学之精华，更兼有明快练达的风范。普鲁塔克以完备而严谨见长；塞内加则丰富多样而富于变化。为抵御懦弱、恐惧和异端邪念，塞内加竭诚修炼自身美德；而普鲁塔克并不看重这些，不屑于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或把自己置于它们的监护之下。因此，他的想法更近于柏拉图式的或禁欲的，较为适合于一种文明社会。塞内加的想法，重接近于斯多葛派或伊壁鸠鲁派。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不过，我倒是以为塞内加的想法更适合于个人、而且又比较牢靠。他的作品似乎表现出对皇帝暴政的屈从；可我敢断言，当他指责凯撒大开杀戒时，他肯定会受到威胁，他的某些判断也是违心的，普鲁塔克就用不

《疯狂的罗兰》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阿里奥斯托所著的浪漫主义史诗。——译者注

维吉尔《农事诗》，，194。

斯多葛派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兴盛的一派思想，提倡一种以心灵平静和坚信道德价值为特点的行为方式。罗马时期，塞内加也是斯多葛派的重要代表。——译者注

伊壁鸠鲁派是伊壁鸠鲁所创的一派。这一派主张快乐、友谊和隐居的行为方式。——译者注

着为什么事物负责。塞内加机智而风趣，普鲁塔克深刻而固执。普鲁塔克启迪我们的理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满足的裨益；塞内加更多地诉诸感性，以激励和刺激我们的欲望。

这里我还要谈一下西塞罗。我从他的著作中蒙受教益最大的是他的丰富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道德学说。但是，对于他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写作风格，我委实不敢恭维，承认这个事实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只此一次，我跨越了懦弱的障碍，摆脱了所有束缚）。西塞罗的著作，往往被那些导言、定义、分类和语源学等内容占去大部分篇幅，而他的点睛之笔和传神之处，却被淹没在这些冗长的论述中。倘花费一个小时来读他的著作（这在我就算够长的了），我究竟能从中得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一般地说，除了读到一些空洞的议论外，别无所获。因为他还未来得及阐述他的观点、论据，抑或谈到那些我所关心的问题。我之读书，并非是为了博学多识、能言善辩，仅仅为使自己更聪明一些。那种逻辑的或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证方法，与我毫无补益。或许，直接从他的结论读起，我还能喜欢上他。不用说，我当然懂得死亡和快乐意味着什么，无需把时间浪费在对其烦琐论证上。我想一开始就能寻找到那些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即那些能够帮助我驾驭死亡和快乐的理由。在这里，任何文法上的精巧或者表达上的机智，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喜欢直截了当，针对令人困惑的中心对话；而西塞罗的著作却总是蜻蜓点水般地回避问题。他这一套，或许在学校、酒吧间、讲坛上还行得通。因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们就是打一刻钟盹，仍不会失去正在讨论的主题线索。西塞罗的论证方式对那些想不择手段说服法官的人是有效的；这也适用于说服孩子或普通人，对他们说话必须面面俱到，这样将会在某一处说到点子上。我不想让什么人花费他的时间来引起我的注意；我更不想让什么人冲我没完没了地嚷嚷：“你听听！听听！”这就像一个放牧人对待牲口那样。罗马人在他们做弥撒时说：“做这个，”（Do this）一如我们经常说：“请留心。”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废话。我出门时已准备停当，我无需诱惑，我能吃未熟的肉，用那些准备和前奏来刺激我的胃口，只会使我觉得厌烦和乏味。我甚至认为，柏拉图的对话也单调乏味，它的意义已为过多的论争所窒息；我的岁数会允许我这亵渎神灵的冒昧吗？人们有那么多可贵的事情去谈，却把时间耗在冗长而无用的争论上，我为之感到悲哀会得到原谅吗？或许，这是我们无知，那倒可作为我的最好借口。我之感到乏味，概由于我没有领悟到他的语言的魅力。但是，我喜欢的书，只是那些能给我以知识的书，而不是那些空洞无味的书。

诸如普鲁塔克、塞内加和普林尼这类作家，就已摆脱了那种“做这个”的刻板说教；他们为那些抱有诚意的读者著书，即使他们也说“做这个”，那也是带有其自身特点的真实的说教。

我还喜欢读《致爱蒂卡斯的信》。这不仅因它含有大量关于历史和西塞罗时代的事件的知识，而且，也能从发现他所特有的幽默中得到满足。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有一种特殊的好奇感，总想了解他们关于灵与肉的见解。从他们那些问鼎世界的力作中，我们的确可以判断他们的天才。但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性格，也不是他们本身。我曾一再

为布鲁图 那部关于美德的书未能传世感到惋惜；不然的话，能从精于此道的人那里汲取知识该多好啊！但是，论道不等于论道者。倘我能在普鲁塔克的书中遇到布鲁图，那就如同我拜读布鲁图的书一样。我更愿意听布鲁图和他的朋友私下交谈的对话，倘我能选择的话，我愿意听布鲁图在战争前夜，与其亲密战友聚在营帐里随意畅谈的内容；而不愿聆听他在次日对部下所作的演讲。同样，我更想知道他在书房或卧室里的所作所为；而不屑于了解他在罗马广场或元老院前做了些什么。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公众的看法，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当然，这不包括他的学识在内。他是一个好公民，天性容易相处（像他这种刚毅而又乐观的人都如此）。但他也确有许多弱点，虚荣心很强。他自以为他的诗够得上发表的水平，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谅解他的这种行为。诗文水平低，这本算不上严重的失败，但问题在于他拒不承认那些与其名望不相符合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他判断上的失误。至于说他的雄辩才能，确实非同一般；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尚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西塞罗的儿子小西塞罗（他沿用了他父亲的名字）在亚洲指挥作战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几个陌生人来拜访他，卡斯蒂乌斯也在其中。正像人们在权贵面前经常做的那样，卡斯蒂乌斯坐在桌子的末端。小西塞罗从仆人那儿知道了卡斯蒂乌斯的名字，但他心不在焉，很快就忘记了。于是，他又向仆人询问：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使仆人苦不堪言。为使小西塞罗不致再忘记此人，仆人对他讲了一件逸事。仆人说：“那个人就是卡斯蒂乌斯，曾经有人对你讲起过他。他对你父亲的雄辩才能颇不以为然，认为他自己要高明得多。”小西塞罗顿时勃然大怒，命人把卡斯蒂乌斯推到他面前，处以鞭刑的惩罚。他可真是一个不客气的主人！

西塞罗的雄辩才能是无可匹敌的，即使那些生性挑剔的人也是这样看的。不过，还是有些人找到了他的某些毛病。他的朋友，赫赫有名的布鲁图就是一个。布鲁图认为，西塞罗的论辩不够连贯且又缺乏阳刚之气。其他一些与西塞罗同代的演讲家也提出一些批评。他们认为，西塞罗在段落的尾部过分强调韵律，特别是他经常把重点放在“可能如此”这句话上。就我本人来说，我倒赞同在诗律中应以韵律戛然而止。西塞罗有时还把各种节奏混杂在一起，虽然这并不常见。下面这个例子就使我惊讶不已，“就我而论，我宁愿有一个短促的老年，也不愿在我尚未进入老年期就老了。”

历史学家为我提供了便利，他们都是一些宽宏大度而又妙趣横生的人。就总体而言，我更多地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完整、生动地了解他们。我发现，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那些迥然相异的内在气质已被和盘托出；这些气质就形成了他们各自的风格（当然，还有那些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意外变故）。我尤为欣赏那些有感而发的作家，因为他们更注重事物的动机而非事件本身；更重视事物的内在因素而非外在因素。这或许是普鲁塔克更令我倾倒的缘由。我们本当有一打第欧根尼·拉尔修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斯多葛派学者，写过许多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均已佚失。只有他同西塞罗相互通信的《书信集》中的两卷留存至今。——译者注

西塞罗：Desenctute.X.

，但即使他本人的著作也没有多少销路，更谈不上能为读者很好的理解。我对此深表遗憾。我渴望了解那些先哲大师的生活和命运，至少不亚于试图洞悉他们的沉思和学说。

在研究历史方面，人们必须涉猎有关作者的全部著述；无论是年代久远的还是新近发表的，也无论是本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研究所得，这样才能从中学到各种东西。凯撒的作品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渊博的史学知识，毋宁说是因为他自身的特点：他较之任何人都更为杰出和完美，这甚至也包括萨卢斯特。我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我是怀着更多的敬仰和尊崇之情拜读的，这也超过了我对其他人文著作的敬意。这种情感，时而来自对于他和他那种不可思议的伟大之沉思；时而来自对于他那无法仿效的优美而纯正的语言之惊叹，仅此而言，他就远在其他史学家之上。难怪西塞罗也说，凯撒甚至也在西塞罗本人之上。凯撒为人坦诚，即使在谈论他的宿敌时亦如此。当然，也有人曲解说，那不过是凯撒极力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野心的手段罢了。姑且抛开这一因素不论，我认为，倘人们有理由责备他的话，那就是他过少地谈论自己。因为除非他所做的远远多于他所谈及的，否则，实现他的如此伟大的业绩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欣赏的第一流史学家就在于他们的质朴。所谓质朴，就是指不附加任何个人主观色彩。他们只是审慎地收集每一细节，不加筛选地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以使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明辨是非。例如，傅华萨就是这样一位好学者。他以坦诚、质朴的态度从事他的事业。他闻过则喜，有错必纠；甚至还记录下许多流行的传闻以及对大事件的各种评论。这些都是历史素材，即未经过人工雕琢的原始材料。借助于理性的力量，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好处。

诚然，杰出的史学家有能力选择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事件。他们能够甄别材料的真伪，能够根据君王的性格和气质来推断他们的动机，给予他们恰当的言词。他们有权获得这样一种权威，即他们能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结论。只是能享有这种权威的人寥若晨星。

大多数人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他们往往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他们喜好越俎代庖，仅仅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常以自己的观念来演绎历史。他们一旦从某个角度做出判断，就竭力避开其他角度来叙述历史。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词藻。他们甚至还经常隐匿某些史料，尤其是那些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的机密材料。无论他们怎样解释，仅仅归结为疏漏是说不过去的。更有甚者，他们有时竟略去某一事件，因为他们不能用好的拉丁文和法文去加以描写。他们只是凭藉无耻来显示他们的雄辩、他们的论据以及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所做出的判断。与其如此，他们倒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他们之后也能做出我们的判断。他们不应该随意选择或删除历史素材中的任何实质内容，应该把它们原原本本地交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一览无余。

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哲学家生平纪事》的作者。——译者注

萨卢斯特（公元前86—前35）：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傅华萨（1333？—1400）：德国诗人和宫廷史官。——译者注

这种人大多是一些植物史学家，在今天，这一领域已为这些庸人所充塞。他们的唯一资格是精通一门语言——好像我们想请他们来教授语法！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雇佣他们的目的原本如此。他们除了兜售空话（这已成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制作华而不实的拼盘，即把那些走街穿巷搜集来的各类传闻附以华丽的词藻。

可靠的历史是由这样一种人撰写的，他们或者是在历史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人，或者是参与引导历史事件的人，或者至少具有带领志同道合者的出色才能的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写下的历史几乎都是可信的。因为当几个目击者编写同样的事件时（在那个年代，往往要把名声显赫和才学渊博结合起来），即使有错误，肯定也是关于某一不重要事件的微不足道的出入。让一个医生来撰写战争史抑或让一个学者来处置君主事务，我们能指望得到什么呢？我们应该观察罗马人是如何审慎处理史学问题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波利奥 发现凯撒自传中有一处错误：到底是凯撒无法亲自严密控制军队，因而相信那些向他提供不实情报的人呢？还是他未能及时从副手那里获悉，当他不在时，那些人做了什么？人们还能从下面这件事中领悟到，探究真理是一件何等细致入微的事情。在战场上，当一个人无法相信自己的上司，或者无法信任那些不在自己身边的士兵时，他应当本着公正而客观的态度，在对需要证实的每一事件的细节作出判断前，先请教一下目击者，了解一下客观情况。所有这些，博丹 都做到了，他和我的思想方式非常接近。

我的记忆力差得惊人，而且，我所忘记的东西甚至超过我所记住的东西，我在若干年前仔细拜读过的某些书（还做了详尽的笔记），竟以为是自己从未读过的新作。为了能稍稍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缺陷，一段时间以来，我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在那些业已读过而又无意再读的书尾做上记号，诸如阅毕日期，形成的总的看法等。这就能提醒我记住，我在读书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些关于作者性格的印象的想法。这里不妨择其二。

大约 10 年前，我在我的《圭恰尔迪尼》中写道：圭恰尔迪尼 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历史学家。我认为，人们能从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中学到真理，而且就像从其他人那儿学一样准确。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他本人就是一名演员，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从不以自己的情感，诸如他的喜怒、憎爱和虚荣等来掩饰什么。这已为他对待那些大人物的坦率直言的态度所证实。他甚至对教皇克雷芒七世和那些曾提携和雇佣他的人也是如此。至于他最引以自豪的东西（我是指他所做的某些发挥和他的某些演讲），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色的修饰，但他过于偏好此道，试图把什么都说尽，未免有些画蛇添足，甚至超出主题范围。他的这一弱点，使人感到有某种拖泥带水的迂腐味道。他关于性格、行为、动机和计划方面的说法引起我的注意。他从不曾把任何东西归因于美德、宗教或良知，就好像这些因素已经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而一种行为无论怎样可贵

波利奥（前 76—公元 4）：罗马演说家，诗人，史学家。著有《内战史》。——译者注

博丹（1530—1596）：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概由其自身决定，他追溯的只是谬误的动机或成功的契机。但是，我们无法设想，在他所认定的无限多样的行为中，竟无一是为理性动机所激励的。腐败之风不可能给人以如此普遍的影响，好像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侵袭。为此，我窃以为他有某种不道德的气味，或许他正是那种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人。

我在“我的”《菲利浦·德·康米尼斯》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你会发现，作者的语言流畅而宜人，质朴而无华；其明晰的表达使作者的善良信仰跃然纸上：谈论自己，他摆脱了虚荣；谈论他人，他摆脱了偏见和敌意。他的谈吐和训导迸发出最忠诚的热情，与其说是对罕见天才的敬重，毋宁说是对真理的崇敬。他处处表现出名门出身的某种威严，兼有受到伟大事业陶冶的人所具有的庄重。

我在《忆贝莱先生》中作了如下札记：读一读那些从自己的经历中有所悟的人所写的东西是一件乐事；但不可否认，从贝莱和马丁这两个大人物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实与自由——这个昔日史学的光荣正在丧失，正如我还能回忆起的圣·路易的亲密朋友儒安维尔，查理曼的总理大臣爱金哈特和菲利浦·德·康米尼斯。贝莱和马丁的著作与其称为历史倒不如说是向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请求讨伐查理五世的战斗檄文。我诚然相信，他们不曾伪造任何事实，但他们确实曲解了某些事件；并且，他们的意见往往与理性相左。他们这样做，或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或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其主子感到尴尬的生平往事。正如有关蒙英朗西公爵和德·布若恩的有失体统的证据被他们一笔略去，而涉及法兰西皇后（弗兰西斯一世的夫人）时，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披露。

隐匿之事可以秘而不宣：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大白于天下的且又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仍然保持沉默，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概而言之，倘要完整地了解弗兰西斯一世，完整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我窃以为，人们必须读些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人物传记中堪称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这两位先生所参预的战事的详尽记载；有关他们秘密谈话的某些记录：有关他们的继承人行为的描写；有关为圭恰尔迪尼所记录下的阴谋和谈判的资料。这里确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且又有很大权威性的东西。

（辛见沈晖译）

罗斯金（1819—1900）

英国作家，批评家，出生于伦敦，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1836年进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中途因病退学，在意大利养病。1871年组织圣乔治会，推行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因得不到社会支持而失败。1879年后隐居于布伦特伍德镇。主要著作有《现代画家》（1843）、《建筑的七盏灯》（1849）、《经济学释义》，散文著作有《时至今日》（1862）、《芝麻与百合》（1862）、《野橄榄花冠》（1866）、《劳动者的力量》（1871）等。其作品文字优美，色彩绚丽，有“美的使者”

儒安维尔（约1224—1317）：法国编年史作者，——译者注

爱金哈特（770—840）：查理大帝传记的作者。——译者注

之誉。

谈 书

一切书籍无不可分作两类：一时的书与永久的书。请注意这个区别——它不单是个质的区别。这并不仅仅是说，坏书不能经久，而好书才能经久。这乃是一个种的区别。书籍中有一时的好书，也有永久的好书；有一时的坏书，也有永久的坏书。

所谓一时的好书——至于坏书我这里就不讲了——往往不过是一些供你来观阅的有益或有趣的谈话而已，而发表谈话的人，你除了观阅其书以外，常常无法和他交谈。这些书往往非常有益。因为它会告诉你许多必要的知识，往往非常有趣，正像一位聪明友人的当面对话那样。种种生动的旅行记叙；轻松愉快而又充满机智的问题讨论；以小说形式讲述的各种悲喜故事；事过境迁，由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确凿事实；——所有这些一时的书，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而日益增多，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物：对于它们，我们应当深表感谢，而如果不能善为利用，还应当深感惭愧。但是如果竟让它们侵占了真正书籍的地位，那我们就又完全用非其当了：因为，严格地讲，这些很难算是什么书籍，而只不过是楮墨精良的书信报章而已。

我们友人的来信在当天也许是有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有无保存价值，就须考虑了。报纸在吃早饭时来读可能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作为全天的读物，便不适合。所以，一封内容关于去年某地的客栈、旅途或天气的有趣记载的长信，或是其中讲了什么好玩的故事或某某事件的真相的其他信件，现在虽然装订成册，而且也颇有临时参考价值，却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书”，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也谈不上真正的“读”。

书籍就其本质来讲，不是讲话；而是著述；而著述的目的，不仅在于达意，而且在于流传。讲话要印成书册主要因为讲话人无法对千千万万的人同时讲话；如果能够，他会愿意直接来讲的——书卷只是他声音的扩充罢了。你无法和你在印度的朋友谈话；如果能够，你也会愿意直接来谈的，于是，便以写代谈：这也无非是声音的传送而已。但是书籍的编著却并非仅仅为了扩充声音，仅仅为了传送声音，而是为了使它经久。一个作家由于发现了某些事物真实而有用，或者美而有益，因而感到有话要说。据他所知，这话还不曾有人说过；据他所知，这话也还没人能说得出来。因此他不能不说，而且还要尽量说得清楚而又优美；说得清楚，是至少要做到的。

综其一生当中，他往往发现，某件事物或某些事物在他特别了然于胸；——这件事物，不论是某种真知灼见或某种认识，恰是他的世间福份机缘所允许他把握的。他极其渴望能将它著之篇章，以垂久远；镂之金石，才更称意；“这才是我的精华所在；至于其余，无论饮食起居，喜乐爱憎，我和他人并无不同；人生朝露，俯仰即逝；但这一点我却见有独到：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入人记忆的话，那就应以此为最。”这个便是他的“著作”；而这个，在一般人力所达到的有限范围，而且也不论其中表现了他真正灵感的多寡，便无异是他的一座丰碑，一

篇至文。这便是一部真正的“书”。

或许你认为这样写成的书是没有的吧？

那么，我就又要问你，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世间还有诚恳二字？或还有仁慈二字？是否你认为，才隽之士的身上从来也看不到半点诚恳与宽厚的地方？但愿诸位当中不致有谁会悲观失望到抱有这种看法。其实，一位才隽之士的作品当中，凡是以诚恳态度和宽厚用心所著成的部分，这一部分便无愧是他的书或艺术作品。当然其中总不免夹杂有种种不佳的部分——例如败笔芜词、矫揉造作，等等。但是只要你读书得法，真正的精华总是不难发现的，而这些也都无愧是书。

对于一部书籍，我们往往脱口而下这类断语，“这书多么妙啊...一恰与我的想法相合！”然而正确的态度却应当是，“这事多么怪啊！我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不过我认为那话是对的；如果我现在还不能理解它的正确，但愿终有一天我能理解。”不管是否这样谦虚吧，但至少应当清楚，当你读一本书时，主要的是去领会那作者的意思，而不是去寻找你自己的意思。进行评论是可以的，那是你程度提高了以后的事；但首先应当弄懂原意。再有一点应当清楚，即是这位作者如果还多少有点价值的话，那么你未必能一。下领会他的意义，至于全部领会更绝非你短期所能办到。这倒并非因为作者没有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甚至相当有力地表达出来；只是作者不可能把他的话全部说完：另外，这点也许更加古怪，作者也不情愿这样，而只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出之）以寓言的方式出之，其目的在于测验你有无诚意。这个原因我就不透，另外，我对一些睿智之士好把他们的思想潜藏胸底、秘不示人的冷酷做法，也不大善于分析。他们在向你传授知识时，不是把它视作一种援助。而是视作一种奖赏；必先弄清你配受奖，然后才允许你去获取。但是这种智慧的探求也正和一种珍贵的物质（黄金）的探求相同。在你我看来，地层的电力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其中所蕴藏的全部黄金都一齐搬运到山顶之上，但是大自然非要把金子隐藏在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穴蹲隙缝之中；你很可能挖了很久而仍然一无所获；想要找到一点儿也得历尽千辛万苦。

在人类高级智慧的探求上，情况也是这样。当你打开一本好书之前，你必须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我自己是否能像那澳大利亚采掘工一样吃苦？我的锄头铁铲是否有用？我的思想准备是否充分？我的袖子是否已卷得高高，另外气力心情是否正常？”如果把这比喻再打下去（即使有点令人厌烦，但这比喻确实非常有用），那么你所探求的金子便是那作者的思想或意思，他的文句便是你为了寻金所必须捣碎和冶炼的矿石。你的丁字镐便是你自己的辛苦、聪明与知识；你的熔炉便是你那探索事物的心智。离了这些工具和你那炉火，你休想去弄懂一位作家的意思；实际上你的一套刀具往往得利而再利，精而再精，你的一番冶炼也得辛苦耐心之至，才有可能挣得一粒黄金。

正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我便要老实不客气地，甚至以权威口气对你讲（因我自信在这点上我是对的），你必须养成对文字深入钻研的习惯，要一点一滴、仔仔细细地弄清每个词的确切意义。一个人尽可以把整个英国博物馆中的图书全部读遍（如果假以天年的话），而仍旧是个“不通文理”和缺乏教育的人；但是一个人却可以仅把一部好书一字不漏地

读上十页——也即是真正精确透辟地阅读，——而从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位受过教育的人。

（高建译）

劳伦斯（1885—1930）

英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生于诺丁汉郡一个矿工之家。中学毕业后当过文书和小学教师，接触了广泛的下层社会。1914年起，过着流浪生活，到过欧美许多国家。1913年发表成名作《儿子与情人》，具有自传性质。此外，有作品《虹》（1915）、《恋爱的女人》（1921）、《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等。还有动物诗集《鸟、兽、花》及学术论著《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他的书信文笔生动，由好友奥·赫胥黎编辑出版。劳伦斯是本世纪西方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因涉及性描写而遭禁十余年。

书 籍

书籍仅仅是玩具吗？意识的玩具？

那么人是什么呢？永远是聪明的孩子吗？

难道人仅仅是聪明的孩子，老是拿书这种印制出来的玩具取乐吗？

可以这么说。即使最伟大的作家也常把大多数时间用于制造绝妙精美的玩具，像《匹克威克外传》或《两人在塔上》。

但这却不是全部。

人是思想探索者。

人是伟大的意识冒险家。

无人知晓探险的历程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们处于这样的位置——已经走过的路是漫长的，而终点却仍遥遥不可见。我们是人类意识的可怜的选民，在浑沌世界的旷野里迷了路，一边咯咯傻笑、胡言乱语，一边安营扎寨，我们没必要再往前走了。

好吧，那就让我们安营扎寨，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反正等到最糟的事发生了，也定会有一个摩西来树起铜蛇；那时我们就可以重新出发了。

人是思想探险家，从古至今从没有停止过思想。最早他的思想体现在木制或石制的小偶像里，后来体现在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里、粘土卷轴和纸莎草纸上。现在，他在书本里思想，在封面和封底之间。

书本最大的弊端便是有封面和封底。当人不得不写在岩石和方尖碑上的时候，要撒谎是很难的，因为阳光太明亮了。但不久他就摸索进了石窟、秘密洞穴和寺庙，在那里他创造自己的环境并对自己撒谎。而一本书就是一个有两个盖子的地洞，一个撒谎的完美去处。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人类漫长的意识探险历程中真正的困境。人是谎言家，他对自己说谎，而一旦他编织了一个谎言，他就会像追随自己鼻

摩西及其铜蛇：《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摩西受耶和华之命率领以色列人前往福地迦南，在旷野中以色列人不堪艰苦而抱怨耶和华，耶和华便使毒蛇去噬咬他们。以色列人知罪后便求摩西祷告上帝，上帝命摩西制一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人一望见这铜蛇便立刻活过来了。